

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及社会支持 ——对湖北省8县市的调查分析

龚文娟, 慈勤英, 王友华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基于2003年7月“湖北省性别比控制的社会政策分析”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 多数人支持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 其中对于宏观的控制政策支持率高, 而对于一些可能与自身利益冲突的具体控制政策, 很多人持保留态度; 地区间对政策的认知和支持存在差异; 性别间的认知和支持也存在差异; 而年龄对出生性别比社会控制的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 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 社会支持; 湖北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5)02-0063-04

Cognition and Social Support to the Control Policy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

GONG Wen-juan, CI Qin-ying, WANG You-hua

(Sociology depart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uhan 43007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sample survey data from the research “social policy analysis of sex ratio control in Hubei province” in summer of 2003, there ar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majority surveyed people support the policy especially its macro-policy aspect, but many people show reserved attitude toward some specific control policies which might be in conflict with their own benefits; there are difference of cognition among areas as well a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However, there is no obvious effect of age on the social control of sex ratio.

Keywords: Sex ratio at birth; Control policy; Social support

一、研究背景

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为108.5, 1987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为110.9,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 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5.6, 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变为116.86。按照国际上长期观察的结果, 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较稳定, 一般在103~107之间。从1982年起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初显端倪, 到2000年时, 发展到了

超出国际公认正常范围约10个百分点^①,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问题日渐严重。

湖北作为一个人口大省, 全省的出生性别比在全国也较高, 2000年五普中其出生性别比为128.18。全省各县市的出生性别比有高有低, 经济发展水平、从业方式及风俗文化也存在差异, 所以本研究选定湖北省8个出生性别比、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层次性和代表性的县市(应城、天门、宜城、当阳、夷陵、松

收稿日期: 2004-07-13

作者简介: 龚文娟(1979-), 女, 重庆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①中国人口普查中的出生性别比, 中国新华网北京2002年5月9日消息。

滋、仙桃、大冶)为研究对象。

二、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1. 资料来源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2003年7月“湖北省性别比控制的社会政策分析”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通过多阶段抽样,共调查了湖北省8个市16个镇31个乡,收回有效问卷996份,有效回收率为96.9%。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研究对象为年龄在55岁以下并结婚的湖北省农村居民,其中包括男性450人,占45.2%,女性546人,占54.8%。

本文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因为对政策的认知及社会支持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对其分析往往难以借助准确的量化指标来完成,因此,除采用问卷法,本文还结合了个案访谈和座谈会的资料对“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及社会支持”进行分析。

三、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及社会支持的比较分析

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及社会支持是一种主观认识,不易量化,所以在本研究调查中将其操作化为“国家应对性别鉴定立法和控制”,“对选择性引流产夫妇应取消其生育指标”,“对擅自做性别鉴定要给以重罚”三方面加以考查。

资料显示,赞成“国家应对性别鉴定立法和控制”的占79.1%,不赞成的占7.2%,表明绝大多数人对控制出生性别比持肯定态度,认可国家的控制政策。在“对选择性引流产夫妇应取消其生育指标”一项中,赞成者占56.9%,不赞成者占25.9%,赞成者是不赞成者的2倍多,但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对这项政策的赞同率比对上一项政策的赞同率下降了22个百分点。同样,在“对擅自做性别鉴定要给以重罚”中,赞同者约67.5%,不赞同者约16.2%,赞同率比第一项政策的赞同率低11个百分点。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半数以上的人赞成国家的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第二,在模糊的政策上赞同者多(如“国家应对性别鉴定立法和控制”),而在与个体利益有冲突的政策上赞同者急剧下降(如“对选

择性引流产夫妇应取消其生育指标”。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们对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和支持状况,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1. 地区比较

分析发现(见表1),在国家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地区支持率比较中,支持率(合并“支持”与“比较支持”,下同)最高的地区与支持率最低的地区相差16.5个百分点(宜城96.7%,仙桃80.2%),其中宜城和夷陵地区的支持率都在90%以上,而实际情况中这两个地区的性别比在这8个地区中也是控制得较好的。8县市中,天门、仙桃和大冶三地的出生性别比是较高的,而这三地人们对政策的支持率相对其他地区也比较低。在不支持率中,天门有3.1%的人不支持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仙桃有5.2%,而宜城地区不支持率为0,地区间差异显著。这些差异与地区间的认知、风俗、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有关,比如大冶、仙桃这些性别比较高的地方,续家谱、修祠堂的风气很浓,而在宜昌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人重视这些;在宜昌,上门女婿是非常普遍的,而在天门,无论女方有多高的地位,男方多不同意上门。

专家们关于湖北省各地性别比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状况:慈勤英的研究显示“对于性别的选择,在天门、仙桃等地,一些人一定要先做B超,一定要生一个男孩;而在当阳,也有做B超的,但无论男女都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不会为性别选择做人流,强调是一个生命。^①”

2. 性别比较

不同性别在对国家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支持率也存在一定差异,男性约88.8%,女性约78.8%(见表2)。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国家应对性别鉴定立法和控制”的赞同率,男性为84.6%,女性为74.4%;“对选择性引流产夫妇应取消其生育指标”的赞同率,男性为62.8%,女性为51.9%;“对擅自做性别鉴定要给以重罚”的赞同率,男性为73.7%,

^① 慈勤英,专家学者谈“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中国人口网,2003-8-27。

表 1 不同地区对国家性别控制政策的态度									(%)
	应城	天门	宜城	当阳	夷陵	松滋	仙桃	大冶	检验结果
支持	46.6	36.2	54.0	49.1	60.3	56.1	41.2	52.9	X ² =46.793 P=0.014 df=28 N=942
比较支持	41.7	49.2	42.7	40.4	33.3	33.6	39.0	34.3	
一般	10.7	11.5	3.2	8.8	4.8	8.4	14.7	11.8	
不太支持	1.0	2.3	0	1.8	1.6	1.9	3.7	0	
不支持	0	0.8	0	0	0	0	1.5	1.0	

表 2 不同性别对国家性别控制政策的态度 (%)			
	男	女	检验结果
支持	55.9	33.8	X ² =22.592 P=0.000 df=4 N=942
比较支持	32.9	45.0	
一般	8.2	15.1	
不太支持	2.1	6.2	
不支持	0.9	0	

女性为 62.4%。对三项政策的赞同率男性都高于女性约 10 个百分点。所以对国家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上存在性别差异，女性较男性的思想更为保守。

3. 年龄比较

在不同年龄段的人中间，对国家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支持率的差异不显著，除 20 岁以下的人 100%支持外（由于人数较少，可以忽略），其他年龄段的支持率都在 87%~91%间波动。在不支持者中，20~24 岁的占 1.8%，25~29 岁和 30~34 岁的人都占 2.3%，35~39 岁的占 1.3%，40~44 岁的占 1.4%，45~49 岁的占 3.6%。如果进行分组，20~24 岁为第一组，25~34 岁为第二组，35~44 岁为第三组，45~49 岁为第四组，不支持率成正弦曲线波动，20~24 岁组和 35~44 岁组为低点，25~34 岁组和 45~49 岁组为高点。

表 3 不同从业方式对国家性别控制政策的态度									(%)
	务农	主务农 兼打工	打工	主打工 兼务农	家庭 手工业	乡村管 理人员	个体 经营	其他	检验结果
支持	48.6	47.6	48.9	54.8	40.6	49.3	52.7	51.2	X ² =31.688 P=0.001 df=28 N=940
比较支持	39.9	38.1	48.9	36.3	40.6	42.0	34.9	37.5	
一般	10.2	9.5	2.1	8.9	12.5	8.7	8.2	6.7	
不太支持	1.0	2.4	0	0	6.3	0	4.1	2.3	
不支持	0.4	2.4	0	0	0	0	0	2.3	

4. 从业方式比较

在人们从业方式特征上，外出打工者、打工兼务农者及乡村管理人员对政策的支持率分别都在 90%以上，并且这三类从业人员对政策的不支持率都为 0。家庭手工业者的支持率最低，不赞同率也最高。其他几类从业者的赞同率都在 87%左右。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手工业者在较为封闭的乡土社会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而外出务工者和乡村管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乡村传统思想的束缚，且容易接受外界更多更新的思想，因而对政策的认知更深。（见表 3）

四、结 论

通过对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及社会支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第一，多数人支持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其中对于宏观的控制政策支持率高，而对于一些可能与自身利益冲突的具体控制政策，很多人持保留态度。第二，通过赋分，发现地区间对政策的认知和支持存在差异，夷陵和宜城的支持率最高，实际的出生性别比也控制得较好，而天门、仙桃及大冶这些地区对政策的赞同率较低，且实际的性别比也较高，这些差异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风俗、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性别间的认知和支持也存在差异，男性对政策的赞同率高于女性；年龄上认知和支持的差异不显著，从业方式的不同也造成了支持率的不同，打工者和乡村管理者对政策的赞同率明显高于其他从业方式的人口。

在本研究中也发现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比如对出生性别比社会控制政策的支持男性高于女性。而我们也知道，在性别选择性出生中，女性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损害，也要承受来自社会的无形压力，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女性应该更赞同政府、社会对出生性别比的反干扰。在我们的调查中，女性赞同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年龄对出生性别比社会控制的影响很不明显，是否是因为在我们调查时点，年轻人中素质较高、较有闯劲的人大多已出外打工，他们与留在家乡的年轻人相比更多地接受现代生育

观念。因为出外打工者调查对象的缺失，制约了年龄这个变量的影响。

所以，要使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必须要让人们认识到政策对他们切身利益的重要性，之所以有部分人对“对选择性引流产夫妇应取消其生育指标”和“对擅自做性别鉴定要给以重罚”政策不赞同，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性别比失调对他们及后代利益的影响，反而觉得这些政策威胁着他们的利益，所以不能从过于宏观的角度进行性别比控制的宣传（比如“危害社会”），应从他们自身的利益着手宣传（比如“养儿防老”的弊端）。另外，对于不同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宣传工作应有不同的重点，比如大冶、仙桃有修祠堂、重男轻女的风俗，天门不接受上门女婿，对此要从经济、文化、风俗不同方面因地制宜地进行与人们利益相关的引导。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 14 页）

[6] 郭志刚. 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中国生育数据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研究. 人口研究, 2000, (1).

[7] 曾毅. 邦戈茨—菲尼新方法的评述、检验与灵敏度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1).

[8] Zeng Yi and K. C. Land. 2001.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Bongaarts—Feeney Method for Adjusting Bias in Observed 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s.” *Demography* 38 (1): 17—28.

[9] Bongaarts. J. 1999. “The Fertility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Timing of Childbear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Population Studies* 53: 277—289.

[10] 同 [6] .

[11] 丁峻峰. 浅析中国 1991—2000 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人口研究, 2003, (2).

[12] 曾毅, 涂平, 郭柳, 谢英. 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近年出生率回升原因的人口学分析. 人口研究, 1991, (1).

[13] 曾毅. 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 人口与经济, 1990, (2).

[14] Preston, Samuel H., Patrick Heuveline and Michel Guillot. 2001. *Demography: Measuring and Modeling Population Processes*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5] 同 [4] .

[16] 王金营. 1990—2000 年中国生育模式变动及生育水平估计.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4).

[17] 同 [6] .

[18] 于学军. 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 人口研究, 2002, (3).

[19] 王广州. 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与应用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3).

[20] 张广宇, 原新. 对 1990 年代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估计问题的思考. 人口研究, 2004, (3).

[21] 郑真真. 中国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5).

[22] 郭志刚, 张二力, 顾宝昌, 王丰.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人口研究, 2003, (5).

[23] 同 [14] .

[24] 同 [4] .

[责任编辑 王树新]